

主 编：老 久 锋 子

难言

“太学生”

——“工农兵学员”酸甜苦辣实录



红旗出版社

难言“太学生”

——“工农兵学员”酸甜苦辣实录

主编 老久 锋子

红旗出版社

(京)新登字 108 号

难言“太学生”

——“工农兵学员”酸甜苦辣实录

主 编 老 久 锋 子

责任编辑 李 凡 封面设计 孟 翔

红旗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沙滩北街2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787×1092 32开·8.4印张·180千字

1994年1月 北京第一版 1994年1月 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ISBN 7-80068-716-3/G·223

定 价 4.50 元

主 编 老 久 锋 子

撰稿人：

南	祖	华	渭	桂	山
贵	一	罗	愫	伊	川

序一 任何教育都比不上灾难的教育

当作者请我为本书作序时，我才有机会浏览了一下书稿。老实说，对于本书的题目《难言太学生——工农兵学员酸甜苦辣实录》，我总感到过于低沉了一些。这绝不是因为，同样曾经是工农兵学员中一员的我，未尝着生活中的苦涩和受冷遇的滋味；也并不是因为，在我的心中，没有对人生最美好的黄金时代和青春年华遭到愚弄和荒废的痛惜和追悔。而是因为，对于已过不惑之年的绝大多数工农兵学员来说，我以为最重要的已不是诉说自己的苦衷和求得人们的理解，在改革开放的大潮已席卷整个中华大地的今天，他们在思想和情感上早已走出了这个低谷，因为在“市场”这个考试官的面前，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果然，当我把这部书稿读完，那一个个同代人的自强不息的奋斗史，他们在改革的大潮中才华横溢、大展鸿图的动人故事，确实使我振奋、使我感动，进而为之而自豪，并使我不由想起迪斯雷里的一句格言：“任何教育都比不上灾难的教育”，这的确是一句至理名言。

我们这一批人是在一个荒诞的时代中度过自己的青春年华的。就我来说，1966年“文革”开始时正好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附中高中毕业，离最高学府的校门仅差一步了。但是，一昼夜间，校长老师成了“牛鬼蛇神”，父母亲人成了“走资派”，自己成了“可教育好的子女”，“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成了必然的归宿。应该说，几年的农村生活对于我这个从小在优裕的环境中长大、没有社会经验和生活经验的青年来说，意义是巨大的。在祖国的边陲农村，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懂得什么是贫困落后，什么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我爱那些淳朴的乡民、那些毫无歧视地把爱给予了我们每个人的父老乡亲。因此，读到本书中“重归伊甸园”一文时，确实在我心中产生强烈的共鸣，读到动人处甚至止不住唏嘘泪下！

随着我先后从小队、大队到进入公社机关，1972年我被推荐上了大学。但在这世上有一个人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那就是来我们县招生的这所大学的数学教师何老师，这位“十七年教育黑线”时期培养的“旧知识分子”，他在我文化考核的好成绩和“文革”运动中在北京的“坏”表现之间毅然地取了前者，把手中唯一的名额给了素不相识、非亲非故的我，从此整个地改变了我的命运。因此，直到今日，我对他仍怀着深深的感激和敬意。

近四年的大学生活，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应该承认，由于学校中无止无休、随意性很大的“教育革命”，开门办学、下厂，还有各种频繁的政治性活动，使我们本应得到的系统化的专业 and 基础课教育被弄得支离破碎，相当一批只有初中甚至小学文化程度的学员使教授们也不得不从“盘古开天地”讲起。这些，使我们与1978年以后入学的大学生相比，学到的知识要相差很多。但同样可以看到的是，在当时的工农兵学员中，热衷于“上管改”的政治上的活跃分子和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混文凭者都是少数，绝大多数工农兵学员都是学得十分刻苦的。这里有两类学员尤其突出，一是许多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学员，他们不满足了老师教授的那一点知识，刻苦钻研、自修，业余时间他们总是一头钻进阅览室里，对社会上和校园中的喧嚣充耳不闻。“文革”以后，他们中许多人成了第一批来自工农兵学员的研究生和出国留学人员。第二类是许多来自农村的学员。他们文化基础差，但却出奇地用功。他们普遍地十分珍惜学习的机会。当然，大多数的工人学员、部队学员也是一样。“文革”以后，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了各条战线上的骨干。

这是有其必然性的。

十年浩劫，我国的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受到空前摧残，陷于严重的停滞。在这样的年代中，有几十万工农兵学员能够走进大学的校园，接受几年的高等教

育，不能不说他们在众多的不幸者中是幸运的。在同代人中，他们无疑是荒废时光较少而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个社会群体。

“文革”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十几年，经济建设重新成为中心，改革开放更使我国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各项事业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十七年”培养的老大学生已远远不敷需要，“文革”以后新的大学生还需要在实践中学习和磨练，正是这种“青黄不接”的历史的断层，使一大批正在科研生产第一线和各种岗位上的工农兵学员脱颖而出！他们尽管先天不足，但没有放弃后天的努力，与几年的课堂学习相比，十几年专业领域的实践是更重要的学习。他们没有值得炫耀的学历资本，唯有用加倍的努力去缩短差距，才能立足。他们中的许多人终于成功了！就如本书中的一个主人公一样。当然，这其中的酸甜苦辣、难言的苦衷自然不少。但最重要的是，他们终于成了生活中的强者，事业上的强人。而且，这不仅发生在缺少科技人才的基层和企业，也同样出现在被称为“象牙之塔”的高等学府和海外学子中。

曾听到一位来京出差的老同学对我调侃说：“我们这一代人可够倒霉的：长身体的时候遇到三年自然灾害；上学的时候，赶上文化大革命；好不容易有了专业工作，又被贴上工农兵大学生的标签入了‘另

册’……”他现在是一个研究所所长，并不象自己形容的那样“惨”。

但有一点却是事实，那就是他们确实经历了不少苦难和荒唐的岁月，经历了过多的跌宕起伏，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使他们更成熟、更有韧性、更懂得如何自强不息，本书的主人公们的自述，便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感谢本书作者为工农兵学员们设立了这个“讲坛”。它是一个催人奋起、鼓励人们去追求光明、追求成功的讲坛。

薛才寥

1993年11月15日于北京

序二 “工农兵学员”现象

大约在汉代独尊儒术之后，为招贤纳士，使“天下人尽入吾彀中”，朝廷设立太学馆，选拔一些官宦子弟做“太学生”，专习四书五经，研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以便将来接父辈的班。这些“太学生”都有非同寻常的家庭背景，学成后又有一条光明灿烂的仕途在等着他们，而且最让人羡慕而又不能让人心服口服的一点，是他们入学时似乎不用经过严格的、公平的公开考试，全凭官宦门第！这种封建特权，曾使那些饱读经书、满腹经纶的富贾或平民子弟们愤愤不平、喋喋不休，直到隋文帝的儿子大发慈悲，允许科举进士，这样一来，竞争才相对公平，学子们对“太学生”的嫉妒和抱怨才渐渐平息下来。毫无疑问，科举制度有其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局限性，但这种相对来说体现着公平竞争原则、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否则，它就不可能一直伴随到封建社会的终结。

时光在流逝，历史在前进，然而前进中的道路似乎从来没有平坦过。伟人毛泽东有言在先：“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此言极当，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已经检验了这句名言的真理性。曾几何时，在共和国的教育史上，出现了一种似

曾相识、让人浮想联翩的社会现象：大学入学不用经过考试，只看学员的阶级出身，唯有出身工、农、兵者，才有资格参加竞争，而用以竞争的标准仅为政治表现和劳动成绩。君不见“白卷英雄”张铁生？只因投机有术，尽管考试得零分，大学照上不误。时髦电影《决裂》中有这样一个场面：某“工农兵学员”因未经过考试而遭讥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校长举着这位学员满是老茧的手，豪迈地说：“这就是资格！”……无怪乎，有的人私下里把这些未经考试、根正苗红的“工农兵学员”戏称为“太学生”。

然而，历史又不会简单地重复，就象哲学家赫利克里特所说的人不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那样，历史也不会倒退到封建社会。其实，毛泽东无意模仿古人，他的所作所为也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就对无政府主义者“劳动者知识化，知识者劳动化”的主张佩服得五体投地，并身体力行，计划在湖南岳麓山上建立新村，作为实验无政府主义的基地。为此，年青的毛泽东还专程北上，在北京的“新村”考察一个多月，被这里的半工半读的学生们边读书边劳动、“有衣同穿，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国家、无政府、无学校”的大同世界所深深吸引。可是，当时黑暗的社会不能容忍这方“净土”的存在，时代也没有为他们提供一块实现其理想的舞台。为此，毛泽东一直耿耿于怀，任凭战火纷飞、世事变迁，他对青年时代“还知识与劳动者”的抱负念念不忘、恋恋不舍。在毛泽东看来，无政府主义者的这种主张没有什么错，实现这种主张的方法也没有什么问题，关键在于当时没有实现这种主张所必需的社会条件，使得当时各地的“新村”组织一一夭折。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指点江山，谈笑风生。可是，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没有科技人才不行。据统计，1952年底全国总人口近5.75亿人，其中科技人员仅42.5万人，每万人平均不到7.5名科技人员。到1955年底，各类科技人员虽有增加，但与毛泽东提出的“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的要求相差甚远，缺口在一、二百万人以上。同苏联等国相比，在校高校学生，每万人中我们是5个，苏联85个，波兰50个，西方发达国家更多，而我国每年只能培养出几万名大学生，以这样的慢速度是很难赶上外国的。怎么办？毛泽东是这样设计的：几十年后，我国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和其他教育事业，也将朝这个目标发展。（详见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372页）在这里，毛泽东并不回避其设想的空想性，维其带有空想色彩，才符合他的浪漫诗人气质，也才能焕发出几千年来幻想、渴求“大同社会”的人民群众的满腔热情。接着，他给国人献出了一个“大跃进”的高招：“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他老人家的号召下，各地掀起一场以勤工俭学、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中心的教育革命。当时，要求全国大中学校师生上山下乡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开展勤工俭学运动；同时要求学校大办工厂、大办农场、大办钢铁，使教学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同时要求全党全民办学，文教事业

大跃进。有人统计，1958年新建中学26000所，全国中学生比1957年增长47%；新办高等学校800余所，在校学生比1957年增长三分之二。

南宁会议期间，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发出了这样的豪言壮语：“十五年内，全国人人都要当大学生。”并说领导干部都要当教授，他自己就正应聘为复旦大学讲课。他还提出具体设想：即每个公社都办一所大学，社员理所当然地成为“大学”的学员。做法虽荒唐，但想法却与毛泽东不谋而合。对此，毛泽东深表赞同，他说：“柯老（柯庆施）说，全民进大学，我也赞成，不过十五年不行，得延长。”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柯庆施真所谓“英雄所见略同”，毛泽东尊之为“柯老”不是没有理由的。那次“教育革命”虽然最后不了了之，中途夭折，但却为“工农兵学员”的问世作了铺垫。

但是，当共和国行进到六十年代中期，列车渐渐开始脱轨，陷入泥潭：党内有“资产阶级司令部”，军内有“一小撮”；干部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人民群众成了“阿斗”……特别不能容忍的是，十七年来，资产阶级在教育战线专了我们的政！这一切的一切，让毛泽东大为失望，他觉得民主革命虽然已完成，但社会主义革命却才刚刚开始。因此，他决定发动一场新的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年，他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勾划了一幅“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美妙蓝图：军队既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农民以农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

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这个大学学校里，似乎人人都能工、能农、能文、能武，工、农、商、学、兵兼于一身，这样一来，“劳动者知识化，知识者劳动化”的理想就能实现……不可否认，毛泽东的主观愿望是好的，其主张带有鲜明的人民性，但是，这种同时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的理想，历史注定是实现不了的。检索一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青年时代的思想初恋，似乎在晚年又燃起了某种“怀旧”之情；所谓“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美妙蓝图，其真正是青年毛泽东“新村”主张的扩版！

1966年6月17日——大概所有的“老三届”都不会忘记这一天，头脑已被煽得发热的北京中学生发出推迟高考的倡议书，因为要“造反闹革命”，哪有闲心复习功课，准备高考！当时他们大概没料到，一时心血来潮，却造成终身大错：这一暂时“推迟”却推到11年后才恢复高考，而此时“老三届”历经磨难，年华已逝，大多数人从此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

当然，动乱期间，伟大领袖并非没有为他们提供上学的机会——上“社会大学”，先是串连，然后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因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但是“社会大学”毕竟不能替代正规大学的文化教育，所以当社会大动乱稍为缓和之后，毛泽东决定大学恢复招生。但是，一向信奉“不破不立”原则的毛泽东为新一轮招生规定了两个先决条件：只招工、农、兵学员，不招应届毕业生；只须干部群众的推荐，不用进行入学考试。

这不能不算是毛泽东在“教育革命”中的一大创举，当时被政治秀才们吹为文化大革命的“十大新生事物”之一。确实，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实质来看，这一招的的确确新鲜：不用经过考试，上学也不是仅仅为了求学，按当时的术语说：“工农兵学员”肩负着“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历史使命”！

——这就是“工农兵学员”的由来。

公元1970年，共和国史上第一届“工农兵学员”终于开进了大学校园。

开进校园的这支队伍色彩斑斓、参差不齐。从职业上看，既有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也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从文化水平来看，有“老三届”高中生，更多的是初中、甚至是小学生！从入学途径来看，经过干部群众推荐者有之，靠父母“开后门”者有之，投机取巧者亦有之，……这是一份多么沉重而又滑稽的入学试卷啊！

凭心而论，“工农兵学员”中也不乏品学兼优（或曰“又红又专”）的学子。倘若倒退几年，凭实力，他们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能堂堂正正地考进大学。有些人文化水平虽差些，但如果让他们适得其所，那么，他们也会成为各行各业的里家行手。可是，当时将这些形形色色、参差不齐的学员硬行塞进同一课堂，其结果可想而知。再加上时兴“政治挂帅”、“开门办学”，因此，这些学员们所学到的文化知识也差别很大。事实求是地讲，其中象张铁生这样的“政治小爬虫”毕竟只是极其个别的，但绝大多数“工农兵学员”都成了时代的牺牲品。

七十年代末在神州大地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的风暴，冲

破了一切“左”的束缚，拨乱反正，共和国的列车开始步入正轨。1977年恢复高考，在考分面前人人平等，学而优则学，劣则汰。这表明我国的教育秩序恢复正常。十年啊，整整等待了十多年，当77级一批品学兼优、经过严格考试的学子们迈进校园，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教授，还是生机勃勃的新同学，都由衷地感到高兴和骄傲。从此僵死的校园被注入新鲜血液，恢复了生机。

小弟诞生，老哥失宠。面对77级新生，“工农兵学员”难免自卑和尴尬。学业不如人，如今政治不吃香，头顶上的光环已失去魅力。再加上社会舆论偏向“正规大学生”，在内外夹攻下，“工农兵学员”的日子委实不好过，由时代的“骄子”沦为社会的“弃儿”……不知论从何出，反正所有的“工农兵学员”在毕业后都经历了统一进行的“资格考试”。合格者留用，不合格者调离工作岗位。特别是在大学，一些“工农兵学员”不得不告别三尺讲台，另谋出路。在时代造成的良莠不齐面前，这种“过筛”自然是必不可免的，但令人费解的是，不论“补考”合格还是不合格者，国家似乎从来没有明确过“工农兵学员”究竟属什么学历，只是他们毕业后的工资级别大约等同于“文革”前的大专毕业生。非驴非马，究属何类？需要指出的是，在一段时期内，社会舆论对“工农兵学员”有些偏颇，但难能可贵的是，上有老、下有小、年过而立之年的“工农兵学员”们并未气馁。确实，他们曾经辉煌过，也曾跌跤，而且跌得很惨，但是他们爬了起来，揩干身上泪水，轻装上路，顽强跋涉。从政的，由于有强烈的事业心和丰富的社会经验，他们中有的已成为行政部门的中坚骨干；“下海”的，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游弋有余，在市场

经济的海洋中纵横驰骋；那些留在科、教战线的，不甘后人，经过一番“自我摘帽”运动，有的已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土洋结合，成为教授、研究员。那些目前还未辉煌、腾达的，象一颗颗螺丝钉，铆在各个关键部位，正在超负荷的运转。成功者有成功的欢乐，失意者有失意的惆怅。无论成功或失败，都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笔者无缘成为其中一份子，有时庆幸，有时遗憾。说实话，对生活在我周围的“工农兵学员”老大哥、老大姐们，我却时常怀着敬意。毕竟每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而“工农兵学员”的经似乎更难念！其中酸甜苦辣、坎坷尴尬、悲欢离合，真是一言难尽、欲说还休。值此首届“工农兵学员”毕业二十周年之际，我们实录了他们的生活自述。

让我们耐心倾听一下这些普通人的坦诚心曲吧！

这是几十名普普通通“工农兵学员”的心灵独白。

这是一代风流人物历史命运起伏跌宕的真实写照。

老 久

1993. 10. 20.